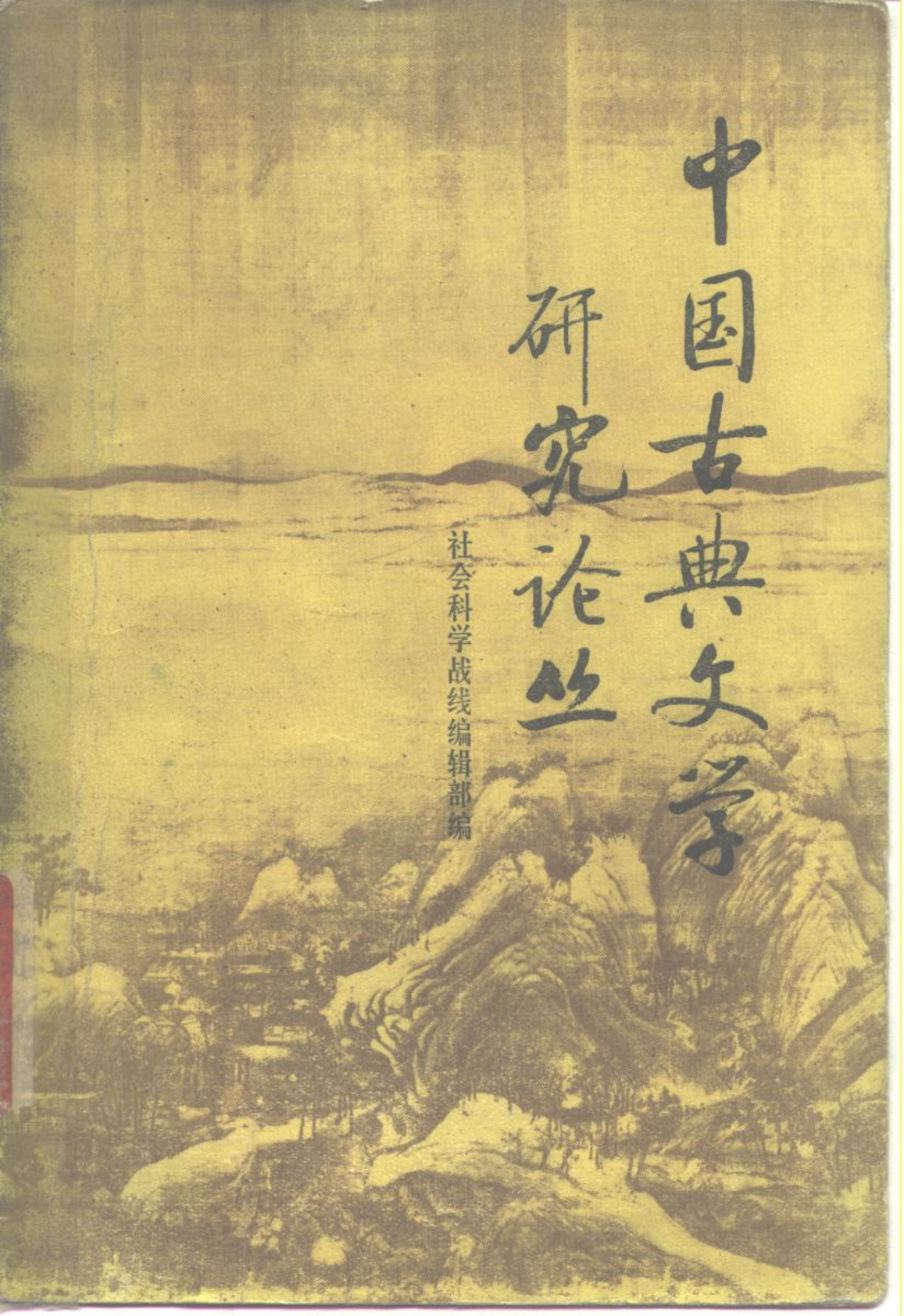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论丛

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



社会科学战线丛书

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

第一辑

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社会科学战线丛书
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
第一辑
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编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5%印张 插页2 354,000字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1,760册

书号：10091·743 定价：1.60元

目 录

《毛诗序》问题辨说·····	王锡荣(1)
试论毛诗大序·····	陈思苓(8)
《关雎》不是结婚乐曲或贺婚歌·····	程 迅(17)
蜂蚁、帝台、中央之神·····	萧 兵(27)
——《天问》新解	
“靺辅奇(畸)牙”·····	萧 兵(34)
——《大招》新解	
“曾(层)颊倚(削)耳,曲眉规只”·····	萧 兵(39)
——《楚辞·大招》新解	
关于陶渊明的评价问题·····	李文初(44)
陶渊明的田园诗·····	钟优民(57)
王昌龄事迹考略·····	傅璇琮(68)
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·····	郁贤皓(108)
李白子女名字及其假想·····	苏 兴(122)
胡小石《杜甫〈北征〉小笺》补正·····	刘开扬(130)
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 的发展·····	陈贻焮(150)
如何认识李贺反藩镇的诗·····	林维民(226)

- 陆游：杰出的爱国诗人……………喻朝刚(234)
- 《草堂诗余》跋……………吴世昌(252)
- 兼论宋人词集与话本之关系
- 评元好问的《论诗三十首》……………李 言(262)
- 《富春谣》作者考……………王春瑜(267)
- 试论关汉卿的创作观……………黄 克(272)
- 从佛教文献论证“南海水月观
音现”……………蒋星煜(293)
- 明刊本《西厢记》偶拾之一
- 曲目拾遗……………陆萼庭(301)
- 说“丑”……………杨廷福(324)
- 青楼集和它的版本……………周妙中(350)
- 《传奇》笺证稿……………周绍良(360)
- 说话札丛……………程毅中(384)
- 《三国演义》赤壁之战的艺术特色……………张人和(413)
- “四人帮”的“架空论”和金圣叹的
“古本”……………文 山 碧 海(427)
- 关于《红楼梦稿》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宋谋瑒(438)
- 《婉婉词》与《虎口余生》传奇……………王利器(467)
- 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浅论……………钟贤培(480)

《毛诗序》问题辨说

王锡荣

《毛诗序》是研究《诗经》很可宝贵的材料，也是古典文艺理论十分重要的著作。其中关于诗歌性质和作诗方法，关于诗歌与现实、政治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等论述，对后世古典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但由于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篇简难免错乱，作者每亦张冠李戴，所以两千年来，对大小序的划分及其作者问题聚讼纷纭，直到今天仍未能获得较为一致的意见。

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由郭绍虞同志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，录《毛诗》《关雎》前五百来字的一篇序言，随后在注解部分录唐人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所引旧说：“起此（按指“关雎，后妃之德也”），至‘用之邦国焉’，名《关雎序》，谓之小序；自‘风，风也’迄末，名为大序。”做为该书编者对“诗序”的看法。

但是，朱东润、罗根泽两位先生对“诗序”又另有主张。朱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^①说：

毛诗《关雎》序一篇，总论诗旨，后人或谓之大序……。

罗著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^②也说：

《关雎》诗的序，全文很长，总论《诗经》一书，人称之为大序；其余每篇都有数言以至数十言的短序，人称之为

小序。

显然，以为《关雎》前一段序言，统是大序。朱、罗两先生的看法亦有根据。唐成伯玑的《毛诗指说》、宋程颐的《程氏遗书》都认为它是大序。稍后，李樗在《毛诗李(樗)黄(榘)集解》里说得更明确，他说：“诗皆有序，独《关雎》为最详，先儒以谓《关雎》为大序，《葛覃》以下为小序。”

张西堂先生的《诗经六论》^③又与上述两说不同，而主张取消大小序之分，总谓之“诗序”。这个看法也不新奇，前述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在援引旧说之后，提出自己的意见说：“今谓此序止是《关雎》之序，总论诗之纲领，无大小之异。”清人崔述《读风偶识》进一步发挥道：

余案诗序，自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以下，句相承，字相接，……章法井然，首尾完密，此固不容别分为一篇也。……由是言之，序不但非孔子、子夏作，而亦原无大小之分，皆人以意推度之耳。

今人主张之有根柢者，略如上述。但前人还有三说，未为今天所注意，不妨录以备考：

一说，将原《毛诗》诸序(包括《关雎序》在内)各分为两截，前半为小序，后半为大序。如宋人程大昌《诗论》说：

古序之与宏(按指卫宏)序，今混并无别。然尤可考者，凡诗发序两语，如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，世人谓之小序者，古序也；两语之外，续而申之，世谓之大序者，宏序也。稍晚，范处义《诗补传》的主张与程同。明人郝敬的《毛诗原解》又称前半小序为首序。这一说法清代甚为流行。姚际恒《古今伪书考》述之颇详：

世以发端一二语谓之小序，以其少也；以下申续者谓

之大序，以其多也。又以小序为古序、前序，大序为后序，今皆从之。

另说，与前恰恰相反，宋郑樵《六经奥论》以《毛诗》诸序发端数语为大序，以下赍续之言为小序。但把《毛诗》诸序各分为两截，则与前同。

最后一说，是宋人朱熹，他的《诗序辨说》认为从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迄“诗之至也”为大序，并把它单独抽出，放在最前；余下部分为小序，与其他诸小序归并一起。

古今众说纷纭，然归纳起来主要有上列六种。但究竟哪一种意见正确，非进行一番详密细致的探讨很难回答。愚意以朱熹的主张最接近正确，其他五种意见都很值得商榷。但朱说却一直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，考其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某些学者囿于门户之见、“圣贤”之说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由于朱熹对自己的主张未能提出有力的申述。其为后世冷落，不为无因。

下面就此问题略陈鄙见，以补续朱说之不足。

今《关雎》序文疑有窜乱，这是从以下两点看出来的：

第一，序前后文意不属。序开头谈的是《关雎》一诗，但自“诗者，志之所之”以下，笔锋直转，忽抛开《关雎》而总论全《诗》，后于“诗之至也”之下，返转来又谈《关雎》，并用顺承连词“然则”接续上文，殊觉龃龉未安，意义亦不连贯。且中间插入的一大段文字，又与《关雎》无涉，致使全文结构松散脱节。崔述《读风偶识》说它“句相承，字相接……章法井然，首尾完密”只不过为了证成他取消大小序之分的主张，并不符合序文的实际。假如把中间一大段文字从原序中抽绎出来，余者倒是一段很紧凑流畅的文章。字数不多，不妨抄录于下：
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

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；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然则，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、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也，先王之所以教，故系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关雎》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；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。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

文中“然则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”的“风”、“化”二字，紧承“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的“风”、“化”二字而来，迹象昭然。全文首先指出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”是“风之始”，接着阐述《关雎》有“风天下，正夫妇”的意义，然后释“风”有风动、教化二义。在此基础上，序文用“然则”这一顺接连词（相当今语“那么”）承上启下，自然说到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二诗系之于“周公”^④的原委，乃因其均为“王者之风”。这样层层推衍，最终达到阐明《关雎》意义的目的。显然，无论行文或述义，均较旧文疏通可观。再看抽出的一段文字，由诗的产生、功用，说到体例、变迁，起迄整齐，首尾一贯，自成体统，而无支离破碎，穿连补衲之弊。

第二，《关雎》序与其他诸诗序体例不一。《葛覃》以下诸序，只述一诗本事，唯独《关雎》一序夹叙全《诗》原理。亦足证明《关雎》序文存在问题。而经过复原后的序就不同了，它虽然也不限于只谈《关雎》一诗，但仅仅涉及与《关雎》有密切相关的问题，而非其他。类似的例子，在别的序里也是存在的。例如《小雅·六月》序，就列举从《鹿鸣》到《菁菁者莪》廿几首诗“亡”的后果，目的在于说明下面变雅的兴起。由此可见，复原后的《关雎》序与众序在体例上就不发生抵牾了。

通过以上简单论证，今《关雎》序文存在窜乱的事实，当

可成立。但为何会发生这样的窜乱?不回答这一疑问,全部问题仍不算最后获得解决。我以为《毛诗》大小序原合为一篇,经后人移动分置诸诗之前,始成如今状态。这是产生窜乱的真正原因。古书直接写于竹木简端,然后用皮条编连在一起,极易磨损。孔子读《易》就曾“韦编三绝”;后人整理古代文献,遇到断简残篇,取舍又多凭主观。因此,古文献很难原样不变地被保存下来。如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战国策》诸著,就多有不堪卒读之篇。《诗经》遭秦火后,是经汉人重新整理过的。后来郑玄等人亦曾按个人的意思,对《诗经》个别篇什和《诗序》编次进行过移动。^⑤郑玄《南陔》等三篇笙诗序笺,以为《诗序》原合为一篇,毛亨作诂训传时,始“分众篇之义,各置于其篇端”。朱熹同意郑玄的主张,说:“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合为一编,毛公始分置诸篇之首。”^⑥所以他在《诗序辨说》里,敢于大胆地把自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”到“诗之至也”一大段文字,从今《关雎》序文中抽出来,置于诸《小序》之前。我认为郑玄说《诗序》原合为一编,是可信的。郑氏的话很可能是采用了当时成说,或依据比较可靠的材料。但把它分置于诸篇之首的人是否毛亨,却值得怀疑。据我的推测,《毛诗序》当作于毛亨诂训传后,毛亨不为《诗序》作传这一事实,就以说明《诗序》不可能作于毛亨之前。因此,毛亨不可能有移动《诗序》之事。这里顺便说一说我对《诗序》作者的看法。关于《诗序》作者,郑玄说是卜子夏,范曄《后汉书》说是卫宏。我是主张毛萇作,经卫宏等人^⑦增广润色一说的。理由是:第一,河间献王用毛萇为博士传诗,是《毛诗》命名的由来(孔颖达谓:“大毛公为其传,由小毛公而题毛也”)。毛萇传诗除继承毛亨的诂训传之外,主要是他写了《毛诗序》。《毛诗》称谓始自

毛萇这一事实说明，毛亨只有诂训传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一家之说，所以还不能称为“毛诗”；只有毛萇作序才使毛氏诗学成为完整的一套，才有被人称为“毛诗”的可能。如果否定《诗序》是毛萇作，那么毛萇对《毛诗》就没有任何新贡献了，时人也就不会有“题毛”之举。第二，《毛诗序》说诗虽自成一家，但总的方面与其他三家说诗的宗旨大同小异（都是为封建统治当辩护士），其论诗本事及主题也与三家互有异同，自不失汉初儒家说诗的面貌。汉初传诗的齐、鲁、韩三家都曾有序，^⑩序作者均为传诗者，故《毛诗序》亦应为毛萇所作。毛萇作《诗序》有大小序之分，这是可以想见的。传诗者对每首诗有具体解说，对全《诗》亦必有一个全面的一以贯之的看法。因此，大小序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。同时，最初大小序自成一编，这在众说并存的情况下，也是不难理解的，正如朱熹《诗序辨说》所说，“然计其初（按指作《毛序》之初），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，非经本文，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。又以尚有齐、鲁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，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，不尽信也。”只有后来为了家法门户关系而自神其说，才有必要把它分置众诗之首，以为是诗人作诗本意，或附会为“圣人”删诗时所加，或假托某一名人所作，而隐匿其真正作者。

根据上面的论证，结合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载卫宏作《诗序》之事，《毛诗序》问题真相相当可大白：东汉初卫宏对《诗序》曾进行过增广润色（参见前引程大昌《诗论》说），同时把编在一起的大小序分别冠于每首诗之前，遂将原大序嵌入《关雎》序内，而混淆了大小序的区分。后来有人主张《诗序》是卫宏之所作，其因盖出于此。至使《诗序》作者问题一直争议了一千多年之久，在文坛上造成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公案。

弄清这些之后，即可作出如下的结论：从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到“诗之至也”一段，原为大序，古时曾独立成篇；余下的《关雎》序和《葛覃》以下诸序原为小序，古时曾合编在一起。大小序之分，是因为大序总论诗旨，关涉《诗经》的全体（当然文字也最长）；小序分述一诗本事，只及《诗经》的部分（文字亦较大序为短）。

以上是个人在学习中偶然想到的一点意见，作为问题提出来，望专家、读者予以批评指正。

注：

①②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③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

④序中“周公”、“召公”疑为“周南”、“召南”之讹。周公、召公均为诸侯，何于召公言“诸侯之风”，于周公则言“王者之风”？又如作“鲁公”，则下文“南，言化自北而南也”的“南”字，据何而出？

⑤⑥朱熹《诗序辨说》

⑦《毛诗序》与《毛传》说诗，时有抵触，这除了说明《序》、《传》并非成于一人之手，也说明《诗序》是经过不止一人修饰，润色加工过的。

⑧《水经注》曾引用过《韩诗序》。黄以周《经说略》只说韩诗有序；朱彝尊《诗论》说韩、鲁有序，未言及齐序。魏源《齐鲁韩毛异同论》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认为齐鲁韩三家均有序，言之甚确，可参看。

试论毛诗大序

陈思苓

一

毛诗大序在封建时代,是最具权威性的诗论;近人还称颂它是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。

前人有说毛诗大序是子夏所作,一向被多数人是先秦诗论最具指导意义,其实,只要分析一下,其中虽采用了先秦儒家诗论的遗说与资料,但基本思想与主要论点,却是汉武尊崇儒术以后汉儒的产物。

汉代四家诗的传授,不仅反映着汉代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特征;也反映出文艺思想的演变,直接地说明了毛诗大序是巩固汉代封建政权的精神武器。

在汉初,传授诗经的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诗,对诗的本事与本义,各家都有不同的说法,各以己见作诗传。《汉志》:“或取春秋,采杂说,咸非其本义”。认为其中以鲁诗最为近“真”。三家诗在文、景之际虽先后立为学官,尚能保存古义遗说,具有先秦学术思想、文艺思想各自独立的特色,如鲁申公以诗经

训解施教，有可疑处即阙而不传(《史记·儒林传》)。齐诗辕固生论诗亦重朴实，告戒公孙弘说：“公孙子，务正学以言，无曲学以阿世”(《史记·儒林传》)。韩诗韩婴亦推诗之意，作内外传数万言，而毛诗多谓是子夏所传，却未立为学官。这说明在武帝未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以前，文化学术界多少还遗留着先秦百家争鸣的面貌。

可是，自汉武尊经崇儒以后，一般官吏及学者每以儒术为饰，如董仲舒、公孙弘、儿宽等皆“以经术润饰吏事，天子器之”(《汉书·循吏传》)。每以经术绳人，蔚成风气，如“皋不通经术”(《汉书·枚皋传》)就受到鄙薄。所谓能通经术如翼奉者流，他治齐诗，论诗有“五际”，附会为封建道德“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也”(《汉书·翼奉传》)。而传鲁诗的刘向，也采取诗经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，撰集《列女传》，以作为法则和炯戒(《汉书·刘向传》)。这都脱离诗歌的实际内容，借论诗以宣扬封建政治与封建道德。

东汉的封建统治阶级又乞灵于图谶决事，借神权思想以建立统治威信。虽然先后有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揭露其虚妄，批判其反动实质，如桓谭指出：“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”(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)，张衡揭露其“欺世罔俗”、“情伪较然”(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)，而王充更针对当时流行的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君权神授”等迷信邪说，痛加驳斥(见《论衡》祀义、自然、治期等篇)。但封建统治思想的权威，终于难以动摇。即以古文家毛诗而论，在西汉仅有河间献王的个人爱好。只是私家传授而已。迨至东汉，以贾逵学识的渊博，虽受毛诗于谢曼卿，但为求传播古文学，以迎合时主的神权思想，上书言《左传》与图谶吻合，不惜以史实附会迷信，得到东汉章帝的赞赏，因而才捎带毛诗随左传、古

文尚书等通行于世。所以《贾逵传》最后范蔚宗的史论不禁叹息道：“桓谭以不善谏流亡，郑兴以逊辞得免。贾逵能附会文致，最差贵显，世主以此论学，悲矣哉！”在封建统治阶级专政的时代，一般文化学术的兴废，大都以最高统治者一人的爱憎为转移。足证两汉四家诗，无论其曾立学官或私家传授，必然会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薰染与支配。

二

流传至今的毛诗大序，其中主要论点，往往摄取前人论诗乐的理论，甚至直录先秦原著以成其说，但却总带着汉儒文艺思想的色彩。

从诗的含义到诗的作用来看，正可寻出汉儒思想的脉络。

首先，毛诗大序论诗言志，以说明诗的本质：

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其基本论点，是采自《虞书·舜典》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”，古代论诗乐合一的传统遗说，及《乐记》谓“诗、言其志也，歌、咏其声也，舞、动其容也”，古代诗、乐、舞综合艺术的遗说；更根据董仲舒论乐“声发于和而本于情”（《汉书·本传》）之说，而提出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以诗的感情，贯穿了诗、乐、舞的全部发展过程，这就把诗的含义的理论，加以系统化，证明毛诗大序虽是从《乐记》等脱胎而出，却由于采用了董仲舒的乐本于情之说，使先秦的理论更臻于完善。

其次毛诗大序论诗与政治的关系。古代是诗乐合一，“乐师

辩乎声诗”(《乐记》),汉武帝时,为得天马作歌,亦称歌诗(《史记·乐书》),故毛诗序论诗,仍继承古代诗乐合一的观点,说明诗乐与政治的关系,竟摘录《乐记》原文:“情动于中,故形于声,声成文,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声音之道,与政通矣”。这与《吕氏春秋·适音》的论乐,基本上相同。毛诗序论诗与政治的关系,直接采用前人论乐的遗说,也是本于董仲舒以先秦论乐的理论转而论诗:“教化之情不得,雅颂之乐不成”(《汉书·本传》)。前有董仲舒的试用,所以毛诗序也接踵而来。

其次,论诗的教育作用,所谓

“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”

关于采用音乐对人民进行教育,自荀子以后,累世不乏其人,荀子论乐的教育作用:“可以善民心,其感人深,其移风易俗,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”(《乐论》),而乐记与刘向论乐(《说苑·修文》)皆重复荀子的论点。其实,在汉代,首先是董仲舒强调乐的教育作用:“故王者功成作乐,乐其德也。乐者,所以变民风,化民俗也,其变民也易,其化人也著”(《汉书·本传》)。证明毛诗序论诗的教育作用,正是反映了汉代封建统治阶级为推行儒家以经术治世,所表现出急切的政治要求。

毛诗大序论诗的社会作用,所谓“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”。这也是来自《乐记》,在《乐记》中,论及乐的作用与影响,在于促使人民归于正道:“将以教民平好恶,而反人道之正也”。特别论乐能与天地鬼神相通:“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,行乎阴阳,而通乎鬼神,穷高极远而测深厚”。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观点,毛诗序作者竟引用来把诗加以神化。这样继承先秦的糟粕,恰好迎合当代统治阶级提倡图谶迷信相合拍,正是“天人

感应”的邪说，在文学领域内的具体表现。

三

毛诗大序论诗的体裁与表现手法，提出所谓“诗有六义”，这是根据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的职守：“教六诗：曰风、曰赋、曰比、曰兴、曰雅、曰颂”。这是古代太师教瞽蒙学习声诗，根据六律调音，用以掌握六种声诗。但毛诗大序作者对诗之六义的区别，并无具体说明，后世只好根据郑注、孔疏等，分风雅颂为诗的体裁，分赋比兴为诗的表现手法。大序只照抄周礼六诗，而于“六义”并无全面阐述，只对风雅颂作了一些解释。这就不能说从理论上总结了前人论诗的经验。其实，风雅颂之名，自春秋以来已累见于古籍，春秋时吴季札聘鲁观周乐，以及荀子儒效篇之论风雅颂，大都已有周南召南、各地风诗及小雅、大雅、颂等名称。至于所谓赋比兴，是否根据孔子论诗的兴、观、群、怨，及春秋时代士大夫赋诗言志的旧传统，从理论上发展而出，不可得知。因其无具体的解说可据，至使后世注疏家各抒己见，造成混乱。一般只好以郑玄注为基准。

先秦论风雅颂，多少还保存诗歌原著的本色，如论国风尚保存民间歌谣的特点。荀子说：“国风之好色也，传曰，盈其欲而不愆其止，其诚可比于金石，其声可内于宗庙”（大略篇）。荀子尚能指出国风是男女相爱的民歌，而经传虽以伦理道德来规范，却也承认这些民歌表达了人民如金石坚贞的真挚感情。但自汉武崇儒以后，无论三家诗或毛诗都带着儒家浓厚的说教意味。郑玄之注周礼六诗，把风雅颂的诗歌，统统称之为宣扬王道圣德的教化。而孔疏就更进一步说：“风雅颂者，皆是施政之